

一個大學校長的自白(2)

劉道玉

第一章 塑造靈魂的故土

人雖說有著巨大的認識能力，但是要全面地、正確地認識自己往往又是個很困難的。直到耳順之年以後，我才敢說對自己有了一個基本的了解，我既有勤儉、獨立、愛思、求變的優點，又有膽大、自負、輕信、抗上（當然不是對所有的領導人都是如此）的缺點。它們從正反面兩方面都深深地影響著我的一生，雖然它們的形成受到多方面的影響，但是主要還是來自於生於斯、長於斯的那片故土。

一、八歲開始私塾啓蒙教育

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廿四日（民國廿二年

農曆十月初七），我出生於湖北省棗陽縣（現改爲市）蔡陽鋪北大劉坡。出生後，父母給我起乳名福元，俗稱福娃；懂事後，自起學名道雨；入私塾後，先生認爲太俗遂改名爲道玉，並賜字叔嘉。

蔡陽鋪位於棗陽縣以西五十五華里處，是以三國時期魏國名將蔡陽命名的。我在孩童的時候，就聽到當地老人講述關公斬蔡陽的故事；那是說關公護劉備從中原一路殺出重圍，來到蔡陽鋪以東兩里地的古城，在那裡遇到了魏守將蔡陽。在相互廝殺中，關公躍馬揮起大刀斬下蔡陽的首級，但是奇怪的是蔡陽的戰馬

卻馱著他的屍身奔跑到蔡陽鋪才倒了下來，致使蔡陽的首級與屍身分葬兩地。

小時候，我在古城確實看到了據說是蔡陽首級的墳頭，但我卻沒有在蔡陽鋪看見他的另一個墓塚。關公斬蔡陽在《三國演義》

中是有記載的，但蔡陽的

首級與屍身是否分葬兩地卻

未能考證。但

不管如何，蔡

陽鋪是以紀念蔡陽而得名是

比較可信的。

這說明，早在

一八〇〇多年

以前，這裡已

是一個戰略要

地，是一個古



驛站，是由漢口到鄂北通商必經的重鎮。

出了蔡陽鎮的北城門，經過一段低窪沼澤地帶，穿過一大片遼闊富饒的畝地，再翻越一座小山崗，我的故鄉大劉坡就展現在眼前了。這裡距蔡陽鋪八華里，步行大約需要一個小

時，我小時候上學和趕集經常往返在這條牛車行駛的大路上。

大劉坡位於前後兩座山崗的谷底，由南向北成「一」字形，全村大約三十來戶人家。每戶的門前有一個平整的泥土的穀場，再往外各有一口大小不等的堰塘，供自家養魚和栽種蓮藕。水塘四周生長著各類品種的梨樹，在屋後乾旱的坡地上，大多種植了耐旱的棗樹。每當春天到來的時候，滿樹的白色梨花、黃綠色的棗花與田間金黃色的油菜花交相輝映，把這個典型的自給自足的村莊點綴得煞是好看了。

當時的大劉坡除了一兩戶旁姓外，全都是姓劉的。我從小就被告知劉氏世系族譜是：「正大光明、道學長興、安邦定世、富澤天

成。」這是本族祖先制定的做人、勸學、治國、致富的格言，它以口授的方式一代一代地流傳了下來，而且陶冶了一代又一代的劉氏的子孫們。我從小也受到了這些家族文化的影響，牢記祖訓，立志要做一個光明正大的人。

我沒有見過祖父、祖母，有關他們的情況，我一點記憶也沒有。他們生育了三個兒子：長子劉明薰，次子劉明蒸（即是我父親），三子劉明蔭。從我記事起，父輩們已分家居住，彼此和睦相處，農忙時相互幫工，平時也互通有無。

我父親具有相當於初級小學的文化程度，會使用算盤，能夠記寫簡單的流水帳。父親是自耕農，主要是從事農業生產，苦心經營著六畝多薄田瘦地，農閒時也到蔡陽鋪街上做點小生意，以補家計。母親劉康氏，是襄陽縣張家集人，娘家距大劉坡十五華里。母親自幼患眼疾，左眼幾乎失明，她雖沒有上過正規的學堂，但卻通情達理，能背誦《三字經》、《增

廣賢文》等書中的許多「醒世恆言」。她信奉佛教，初一、十五吃齋，燒香念佛，看得出她無時無刻不在為我們兄妹的成長、為家人的平安和渴望農業好收成而祈禱。她為人心地善良，樂善好施，但總是在生活上克扣著自己。母親對我從小的教誨是用心良苦的，無論是在勤奮勵志還是處世待人等方面，我都深深地受了她的影響。

我的家鄉地處崗坡地帶，最嚴重的問題是缺水，從我記事起，旱災蟲害連年不斷，基本上是過著靠天吃飯的日子。我們家境並不富有，但父母都十分重視我們兄弟的教育，他們含辛茹苦，節衣縮食，似乎他們早就懂得了「再窮不能窮教育，再苦不能苦孩子」的樸素道理。他們也深知，只有讀書才能擺脫貧窮，也方可改變我們未來的命運。

父母生育子女五人，成活的僅我們兄弟三人。大哥乳名叫旺，學名劉道旺，他是湖北省第八高中的學生，比我大九歲。他於一九四二



年參加青年救國軍，當時是高二的學生，他在上高中時已經完婚，大嫂劉翟氏賢慧能幹，對父母和我們兄弟都很好。大哥參軍後在雲南境內受訓，爾後準備開赴抗日前線，但是他未能等到這一天，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了。抗戰勝利後，大哥因身體原因復員到棗陽七方區糧管所工作。可惜的是，他在那裡只工作了一年多的時間，因為癆病而早逝（時年僅廿三歲）。我記得，大哥的去世使父母悲痛不已，他們遣二哥和我步行卅多里去大哥的工作單位取回了他的遺物，那當中唯一有紀念意義的東西是一件軍用毛毯，我們把它保存了很久很久。父母都很開明，鑒於大嫂很年輕且還未生育，於是勸她早早地改嫁了。

二哥乳名叫起娃，學名劉道啓。據父親說，我們兄弟三人的名字中，包括望（旺）、祈（啓）、雨三個字，就是盼望老天爺賜降喜雨，以保農業豐收。我記得小的時候，每當久旱不雨的時候，全村的男女老少傾巢而出，戴

著斗笠，披著蓑衣，帶著供品，點燃香火，設祭壇，在烈日炎炎中跪在發燙的地面上，不停地向龍王磕頭，祈求這位統領水族的大王興雲降雨。可是，龍王爺並沒有開恩，年年祭祀年年乾旱，在科學技術水平很低的那個時代，農民們既沒有力量興修水利，也不懂得「人定勝天」的道理。

我的家鄉雖說是缺水少糧的窮鄉僻壤，但那裡卻是東漢開國皇帝劉秀的故鄉，是三國古戰場，也是最早的蘇維埃根據地之一，一九二四年就舉行過一次秋收起義。因此，我的家鄉不僅具有悠久的歷史，而且有著光榮的革命傳統。一九九三年十月，劉秀誕生二〇〇〇周年，棗陽市政府召開了「劉秀誕辰二〇〇〇周年紀念暨學術研討會」。同時成立棗陽籍海內外鄉親聯誼會，我被邀請赴會。在會上，我作了「劉秀的柔道思想與現代管理」的學術報告，末尾我吟詠了一首《遊子情》的詩：

八方遊子邀還鄉，
濟濟一堂憶今往。
山水最是家鄉美，
月是故里最明亮。
內外聯誼是橋樑，
改革大計相與商。
振興帝鄉匹夫責，
「白水精神」再弘揚。


後來，我聽說這首詩被臨摹刻製成碑文，豎立在皇村的白水寺裡的碑廊內，我惶恐不安。詩當然不是好詩，但情意是真切的，它既是表達我對故鄉的摯愛與祝願，也是我留給她的永久的紀念！

我八歲那年開始接受啓蒙教育，比城市的學齡兒童要晚了兩年，原因是父親無力同時供給我們兄弟三人讀書。我的啓蒙教育是從私塾館開始的。當時蔡陽鋪已有一所公辦的中心完全小學，但爲什麼要捨近求遠，到十里之外

的翟家古城去讀私塾呢？因爲私塾具有較大的獨立性和靈活性，地處多村的私塾必然要爲農業生產服務，農閒開館農忙放假，每年上學的時間大抵只有四個月，春夏秋農忙時，我們都得留在家裡幫父母幹農活。在學費方面，私塾也比公立學校低廉，方式也靈活多樣。我記得每個月的學費是三斗大米，平均每年需交學費一石多大米。如果沒有大米，也可以折換成小麥、高粱、布匹或現金交納，甚至還可以賒欠。顯然，這些便利的條件正是父母讓我們到私塾讀書的原因。

二哥比我大五歲，我倆一起進私塾，同時接受啓蒙教育。寒冬臘月讀書，往返甚是不便，我們便借宿在大嫂娘家，自帶柴米，下飯菜是母親爲我們準備的腌菜。二哥年長厚道，挑水、劈柴、煮飯都是他包辦了，夜裡還幫我蓋被子，對我十分關愛，這種手足之情無時不溫暖著我的心。

翟家古城塾館是由一位姓翟的秀才舉辦



的，我們不知道他的名字，人們都稱他為翟秀才。他年近花甲，視力稍有近視但沒有配戴近視眼鏡，念書時要把課本貼近眼睛。他身體瘦弱，說話文縷縷的，有哮喘的毛病，據說，他年輕時很有抱負，順利地通過了鄉試而獲得舉人的資格，但由於體弱多病，未能參加進一步的科舉考試。入仕無望，只能抱憾隱居鄉村以教書為業。

私塾教授的內容，實際上是從中國傳統文化啓蒙開始的，《三字經》、《百家姓》、《增廣賢文》是必讀的讀本，要反覆講解、反覆背誦，從背段落開始，直至最後要把全文背誦出來。翟秀才教書要求甚嚴，規定學生必須做到：坐立要端正，讀書要出聲，習字要工整，朗誦要押韻，背書不停頓。一般前半晌是上國文課，內容是《三字經》、《增廣賢文》，後來也講讀一些古詩詞。我記得最早背誦的一首詩是：「鋤禾日當午，汗滴禾下土。誰知盤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」這首詩是農村生

活的寫照，前兩句寫農民勞動的艱辛，後兩句是形容糧食的珍貴。我從小生活在農村，親身體驗過「勞其筋骨」，嘗過「餓其體膚」之苦，所以很容易記住這首詩，銘記在心，使我從小養成了勤儉的習慣。

在私塾，十分重視練習毛筆字，一般後半晌都是寫字，從疊紙、磨墨、握筆學起。開始是照著字帖寫，等練到一定基礎以後，就脫手寫，習字的內容是《百家姓》，字體主要是楷體，先是大楷後是小楷。私塾的學習生活是十分單調的。翟秀才總是一副面孔，學的內容周而復始，當然隨著時間的推移也在不斷地加深。從第二年開始，除了國文、習字以外，還教授算術和珠算，那時我們對珠算特別喜好，這不僅僅是因為它在實際生活中很有用，而且它是那時惟一的形象化的教學。

我和二哥都深知，父母供給我們讀書殊為不易，所以我們都十分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，特別是二哥，十三歲才開始啓蒙教育，

更是發奮努力。但是，農村學習條件惡劣，再加之老學究的空泛死板的八股式的教學，總是引不起我們學習的興趣。我們感到最困難的是背書。有時老先生特別挑剔，指定你從第幾行背到第幾行，或命你倒背如流。每逢遇到這種情況，我們都很緊張，有時兩腿直打顫，心裡越發慌就越出錯。私塾十分看重背書，甚至把它看成是一個學生天資的主要標誌。翟老先生威嚴有餘，不苟言笑，凡是背不出或背誦出錯者，都要受到懲罰。輕則罰站，重者用戒尺打手心，或用竹棍磕打腦袋瓜。我們同期學習的七八個學生中，無一例外地挨過他的打，和我二哥是兩個極端，他在班上挨打是最多的，而我是挨得最少的。體罰觸痛的往往只是肌膚，傷害的卻是心靈，起的作用是有限的而且是短暫的，隨著疼痛的消失而把老師的訓斥也拋到腦後了。體罰的一個負面效果，就是產生了師生之間的對立情緒，那時我們也想出一些辦法以對付竹棍，就是在帽子裡墊上厚厚的馬

糞紙或棉花套，以防腦殼被打傷。我對體罰教育是痛惡的，正由於我在兒童時有皮肉之苦的經歷，所以我在一生的教育生涯中，才大力倡導博愛教育，不遺餘力地呼籲廢除一切體罰或變相體罰的懲罰主義的教育。

我在私塾受教三年，時間雖然不長，但對我的一生卻產生了重要的影響。

首先，私塾教育對於我樹立志向曾起到了指引的作用。我剛入私塾時，翟老先生見到我的名字後，搖晃著腦袋說：「太俗，不雅。」於是，他揮筆將「雨」改成了「玉」字，略思片刻，他又說：「讀書人應當有個字，我也給你起個字，就叫叔嘉好了。」他解釋道：「在古漢語裡，伯、仲、叔、季是代表兄弟排行秩序的，你是老三當取叔字，玉乃嘉寶也，故叔嘉就是你的字。」後來，他在與我的一次談話中說，一個讀書人應當有遠大的理想，是其志可嘉也。他還常說：「國家興亡，匹夫有責。一個正人君子，應當做到嘉言懿行。」翟老

先生是我平生第一個蒙師，我接受了他賜給的字，銘記他的教誨，並以此不斷地勉勵自己。

其次，私塾學習生活使我自幼養成了刻苦的精神。舊時農村生活環境，本身就是磨礪苦功的煉獄，再加上私塾所倡導的「寒窗苦讀」的教育理念，所以我從小就在心田裡播下了苦讀的種子。在私塾期間，翟老先生經常掛在嘴邊上的一句話總是離不開一個「苦」字。他說：「苦，苦，苦，不苦何能通古今？」那時，我未敢奢望博古通今，但確實暗下決心要通過苦讀來擺脫苦難的農村生活，並從此走上了一條苦學、苦幹、苦索的人生道路。

再次，私塾學習生活使我獲得了初步的文化知識，為進一步吸收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打下了基礎。雖說我後來進入了公立中小學，特別是考上大學以後，逐步地走上學習和研究自然科學的道路，但我仍然對中國的傳統文化很有興趣。其中《論語》一書就是我畢生反復閱讀的一部經典。我個人的修養，治學的態度，

處世待人格守的原則，大多都源自孔子的教誨。在孔子時代曾出現過「百家爭鳴」的盛況，後來毛澤東也提出了「百花齊放、百家爭鳴」的方針。我在花甲以後，才悟出了取其各家之「長」而避其所短的精神，提出熔四大家為一爐的概括：

「做人要信奉儒家之道統，謀事要發揚法家之精神，決策要借鑒兵家之韜略，養身要篤行釋家之超脫。」這是我幾十年生活的提煉，也是我從小所受中國傳統文化的薰陶。

（本文作者劉道玉鄉親曾任武漢大學校長多年。本章曾在本刊發表，但原稿多有修正。謹白）

